

中国早期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进展

——写在《丝路青铜器·天山卷》出版之际

林 沅

关键词：北方系青铜器 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 铜镜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25）04—0038—04

DOI: 10.16363/j.cnki.xyyj.2025.04.004

1982年，我在《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①一文中，指出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中原和东北地区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提出了“北方系青铜器”这一学术命名，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我所说的“北方地区”并未把新疆包括在内，却把“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很遥远的地方，即“远远超出现在的中国国界，发现于蒙古、外贝加尔、土瓦、米奴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阿尔泰。更西面在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到黑海沿岸也有零星发现，在伊朗高原的古代青铜器中也有相似的标本”。其实，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不同于中国北方的考古学文化，只是有少数的发现物和北方系青铜器相同或相似，且为我所知而已。

在随后继续研究北方系青铜器的过程中，我发现像漏斗形耳环（即喇叭口状耳环）、套管式铉等青铜器只能是通过新疆传入中原，逐渐意识到新疆在整个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001年起，我作为课题负责人，课题“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获得立项，对于长城地带的西段应该划到哪里，颇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受材料的限制等，对新疆地区出土青铜器缺少研究。北京大学的李水城，在2002年就主张从冶金技术的角度，“将河西走廊与新疆东部整合为西北地区的西部，与齐家文化的东部相对立。”^②而在新疆工作的刘学堂、李文瑛合著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的新探》^③，则明确提出了应该把新疆、甘肃和青海划为一个“西北青铜文化圈”。将新疆青铜器与中国西北其他地区的青铜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① 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该文1982年9月在美国火奴鲁鲁召开的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I》，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9～155页。

②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9～278页。

③ 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的新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编《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刘学堂 1981 年入学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985 年到青海西宁进行毕业实习，整理辛店文化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墓地的材料。我审阅过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印象中颇有些新意。2005 年，他们班毕业 20 周年在长春相聚，我请他介绍了他的学术观点、新疆青铜器的全貌以及新疆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我觉得他是我研究新疆青铜器的好帮手，2006 年我们共同申报并获批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资助的“新疆古代青铜器”课题。

2006 年 10 月，我和吉林大学年轻教师魏东、林雪川到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地实地考察，发现新疆公布的青铜器材料，相当零散。更多采集、征集来的青铜器收藏在各地文物单位的库房里，要完成图文并茂的“新疆古代青铜器”项目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当时并不具备这样条件，特别是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材料迟迟没有公布，缺少了这一墓地的材料，项目本身的意义就不大了。而且原课题设计打算人种、金相一并研究，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有时限要求的项目本身未能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去年年底，《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① 的考古报告公布，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刘学堂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就写出了图文百万言的《丝路青铜器·天山卷》的书稿，该书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正像他在前言中所说，这应该是“新疆古代青铜器”这一项目学术意义的最终结项，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仍可以聊以自慰。而对我这个早已退休的老人来说，是了却了一桩未了的宿愿。

《丝路青铜器·天山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图文并茂，以文为主。下册为彩版，达 400 页之多。上册分为九章。第一章介绍了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对新疆地区史前晚期的考古文化谱系结构进行了归纳概括，以列表的形式梳理了中国早期青铜器研究的历程。第二至八章是新疆地区史前青铜器材料的整理与分析，分区介绍了新疆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对中亚西部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青铜器发现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因为青铜器不会孤立存在。每章都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所述青铜器遗存做简要介绍，并配图展示了重要遗迹和遗物的特征，还列表统计了青铜器遗存的简要信息，查阅起来非常方便。后一部分是对不同区域青铜器进行分类分型和分式的介绍。就目前新疆青铜器的发现情况而言，几乎没有明显的遗漏，材料信息完整详实。应该指出，其中相当一部分青铜器是各地博物馆的收藏品，材料查找难度很大。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过去，研究新疆早期铜器最大问题是资料搜集上的困难。该书把资料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极大地缓解了新疆早期青铜器研究中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困局，这是该书的一大优点。第七、八章对中亚西部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发现也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为将新疆史前青铜器放在整个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视野进行考察，奠定了基础。该书并未止于青铜遗存的汇集和介绍。在解决研究新疆青铜器的争议问题上，也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第一个问题是遗存的绝对年代问题。年代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中国西北包括北方草原地带史前考古文化的年代，特别是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争议较大，常常让人莫衷一是。新疆罗布泊小河文化遗存因其完好保存着未经破坏和干扰的原始层位关系，选用出自不同层位最可能是当年生的小麦粒及其他为样本，科研人员分别在国内相关机构利用目前最先进的测年技术进行系列测年，并与层位关系进行了校验匹配。比较起来，小河文化遗存所测得的绝对年代数据更为可靠，这为整个新疆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器的年代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文物出版社，2024 年。

第二个问题是青铜器的类型和组合问题。以前,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青铜器遗址中,青铜器每每少而散乱,很难从青铜器类型组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了3000多件青铜器,青铜器共存现象十分普遍,器物类型丰富,同时代西北地区其他文化遗存均非所及。刘学堂参加了这一墓地的发掘,他以600多件陶器的类型学考察为基础,结合72组墓葬的层位关系、结合49组组合关系,加上系列的碳十四测年,为我们勾画出这一时段青铜器发展与繁荣的完整图景,为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青铜器兴起、源流、组合、特征、功能等多方面的探究,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这是该书的另一大优点。

第九章是全书的结语,是以欧亚草原为舞台,专注青铜器而勾勒成的一幅历史画卷。从第八章开始,刘学堂就尝试构建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的学术概念,这种主张,他和李文瑛在20年前就已形成。我当时还没有把属于“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内的新疆,看作中国“北方地区”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2008年写《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①、2010年写《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②,才完全接受了新疆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只有认识到“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是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的有明显特征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使我们对北方系青铜器的整体结构有更深入的理解,拓展北方系青铜器研究的视野,结合欧亚草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化,如实展示内陆欧亚青铜器的源流、融合和变迁的历史图景。正如我在1982年的论文中曾描述的“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形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周围的地区。”

第九章中的一些讨论,可谓点睛之笔,像早期铜镜的起源、传播与功能问题,刘学堂在1993年《新疆文物》上就发表过论文,^③并引起过不大不小的学术争论。本书搜集了远远多于当年同类型器物的材料,论据也更为充分。特别是他注意到持中国铜镜外来说所凭依的中亚西部的所谓早期铜镜,那些无钮凸面或平直的圆形铜器,只是圆形牌饰而已,与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发现的背部具钮的早期铜镜没有源流上的关系。铜镜这一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起源于新疆,已成定论。又如,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的长方形镂空兽面铜牌,刘学堂将它放置在整个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梳理,提出了起源于新疆的长方形镂空铜牌的看法,使人感到别开生面而不能不信。刘学堂还围绕着环首铜刀、螺旋状首铜手镯、盾形铜牌、不同形态的铜扣和铜泡、齿轮状圆牌、圆环、圆牌形首簪状铜器等许多的铜器,介绍其发现与年代,探源溯流。这些器物大部分是整个中国西北和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中的新问题。如齿轮状圆牌、圆环等,在陶寺和石峁遗址的出现十分突兀,其源流难以索解。刘学堂提出的新识,对于大家进一步理解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对于我们以新疆为中介,理解中亚与中华文明的深层次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从整个内陆欧亚草原视野看,关于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多年来名家巨著迭出。但因新疆地区史前青铜器发现得晚,公布又不及时,而且已公布的往往年代不明,所属考古文化不详,所以在过去的著作中很少提到。杨建华、邵会秋、潘玲在

① 林沄《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2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又载《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142页。

② 林沄《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考古》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③ 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121~130页。

2016年出版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一书，才给新疆地区的史前青铜器以应有的地位。但和其他地区比较，仍有语焉不详之感。刘学堂的新著则提供了一个北方系青铜器“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的全面视野，因而能深化研究者对欧亚草原青铜器整体的系统和结构的认识。这是该书的第三个优点。所以我建议能组织队伍，及早将该书译成英文出版，使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在欧亚草原青铜器研究中大放光华！

我非常赞同刘学堂在本书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论述，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感而言“中华文明的航船之所以历经风浪，久经风雨，五千年从未中断，有许多深层的原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包容四海，容纳世界的特质。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包容四海，兼容并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这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主线，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德，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我们整理和继承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更能增强文化的自信，更能以广阔的胸怀拥抱世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我愿与刘学堂以这段话共勉之。

是为序。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王常兴

责任校对：宋 俐